



并非一味从轻

依《大清律例》，十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享有法律宽宥特权，其杀人案可上请由皇帝裁决，刑罚从轻处置。然而，对于刘縻子殴打李子相致死一案，乾隆却驳回了地方督抚“拟减等至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收赎，追埋葬银二十两”的上请，按照正常律法判处刘縻子绞监候（相当于死缓）。

而且，从此案开始，乾隆帝设置了对十岁以下儿童犯罪上请的限制：“十岁以下斗殴毙命之案，如死者长于凶犯四岁以上，准其依律声请。若所长止三岁以下，一例拟绞监候，不得概行声请。”

可见，古代法律的恤幼矜弱并非一味对未成年犯罪进行从轻发落，而是考虑案情、据情而决。

刑事责任年龄界定

对于未成年犯罪问题，历

未成年人犯罪的古代判例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四川盐亭县。这天，同为九岁的男孩刘縻子和李子相，一同在河坝放羊。午憩时，刘縻子向李子相讨要午餐葫豆，李子相并未吝嗇，把自己的葫豆分给了刘縻子。刘縻子食毕再次讨要，李子相不给，刘縻子竟恼羞成怒开始辱骂、殴打李子相，二人纠缠中，李子相被推倒，腰眼不慎撞到石头，当场丧命。这件九岁男童杀人案，该如何判呢？

朝历代处罚颇为不同，但是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对未成年人的“矜弱恤幼”原则。

西周时期以年龄作为确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依据。据《礼记·曲礼》载，八九十岁的老人和七岁以下的幼儿，即使犯罪也不对其判刑。

秦朝以身高作为确定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依据。以秦简《法律答问》所载一个案例为例：“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约139厘米），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约155厘米），问甲当何论？当完城旦（一种筑城的劳役）。”

汉代则以年龄作为划分刑事责任的标准。如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下诏：“年末满八岁或八十岁以上，非手杀人，皆不坐。”

唐朝时，《唐律疏义》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年龄划分为：十岁至十五岁；七岁至十岁（不含十岁）；七岁以下。这三个年龄段的未成年罪犯在判罪量刑时皆有不同条件和程度的宽宥。

明朝时对未成年罪犯予以单独关押监禁，发展出专门的少年监狱。

清朝的特殊判例

顺治时期，有个吴三红眼案。十四岁的周二蛋卖饼子，十五岁的吴三红眼赊账欠了钱。后来周二蛋遇到吴三红眼时，索要饼子钱，吴三红眼承诺第二天来还钱。

然而第二天吴三红眼并未还钱，还在周二蛋同意后再次赊账吃了三个饼子。赊账时，吴三红眼承诺次日会将钱一并归还。但是没想到，等吴三红眼吃完饼子，周二蛋却要求他立刻归还所有饼子钱。两人争吵中，周二蛋顺手拾起路上的石头投向吴三红眼。吴三红眼被打着急，怒火上来

一把夺过石头，并砸向周二蛋的头部，周二蛋当场死亡。

按大清律法，殴打他人致死当被判处绞刑。考虑到案件中周二蛋不守承诺当即要钱和吴三红眼赊账不还皆有错误，此案的判决执行宽宥政策，判吴三红眼为绞监候。

嘉庆年间，有一起熊照案。该案源于林奉向熊照借钱买酒，遭拒后，林奉辱骂并推搡熊照，见其起身反击，便又拿起石头要攻击对方。熊照害怕被伤，便顺手拿了尖刀乱戳吓唬林奉，不料尖刀戳中林奉右后肋，林奉毙命。

此案中，熊照年十五岁，林奉十九岁。此案上请后被驳回，理由是：“此案死者因借钱买酒起衅，并非实在理屈……拿刀吓戳，又非实在情急。”最终此案维持正常判决，不予宽宥。（据国家人文历史微信公众号 夕惕/文）



尊老爱幼 传承家风



中国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修史可以用来教化、资治和明道，但也常被古代统治者用来美化自己的过去。不过，修史被借用为杀人之刀，却不多见。

二

魏忠贤擅长拍马屁，入宫没多久，便受到提拔，到明熹宗身边当差。成为皇帝面前“红人”后，官中很多人开始巴结他。但东林党人却看不起他。魏忠贤为掌握实权，开始处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东林党。双方形成各自的阵营，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朝中打响。

阉党为了打击东林党人，炮制了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其中对

明朝有本“杀人”的书

“挺击”“红丸”“移宫”三案进行翻案是重要步骤之一。魏忠贤让其死党顾秉谦带几个人重修当代史，以便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阵地——利用舆论当武器。

二

万历帝曾想立宠妃郑氏的儿子常洵为太子，这违背“立长立嫡”的祖训，遭到朝中东林党人的极力反对。万历帝孤立无援，只能立长子常洛为太子。男子张差手持木棍闯入太子寝宫，打伤太监后被生擒勘审。张差一口咬定，自己收了郑氏手下太监庞保、刘成的钱，才去杀太子的。但张差语无伦次，似乎精神有问题。万历帝下令以疯癫奸徒罪处死张差，并秘密杀死庞保、刘成，草草了结“挺击案”。

光宗常洛即位后，郑贵妃为讨好他，挑选8名美姬进献。光宗本已虚弱的身体，更

海绵青年

有一次我度假归来，在机场听到航班取消的广播。午夜时分，大雨中，我站在天津滨海机场，打开手机App，看看有没有能把我的捎回北京的顺风车。

一辆商务车飞快地来了，我上车，然后低着头回复手机开机后涌入的各种信息。一段语音之后，突然听见车主问：“您是做杂志的？我听见您在说编辑和选题，能咨询您一件事吗？”我抬起头，看向车机的后视镜，一个相貌端正的年轻人，有些不好意思地等着我回答。“有什么事吗？”“我前一阵儿在街上玩滑板，正好碰见一家杂志社在拍服装片，看我玩得不错，他们让我入镜拍了一组照片。后来他们也没给我寄杂志，我挺想要照片的，我该找谁啊？”

我耐心地给他讲了如何按版权页找到责任编辑之类的事。我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聊了起来。我很快勾勒出这个青年的职业背景：就职于一家国际化生产企业，经常往返于北京和天津开发区，顺路做顺风车车主，一路上也不至于很枯燥。

我还从他的叙述中听到一个传奇的故事。他是体育特长生，甚至打进了职业赛，但因为意外受伤而退役，然后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在想

东林党人的形象。阉党借助舆论之力，把政敌往死里整，很多东林党人被迫害致死。

这种形势在崇祯帝即位后得到逆转。他常年生活在宫中，对魏忠贤阉党的罪行，耳闻目睹，一清二楚。他登基刚三个月，便一举铲除了阉党。他给被诬陷的东林党平反，并下诏毁掉《三朝要典》，将其列为禁书。

但到了弘光朝廷，《三朝要典》依然是政治斗争的武器。弘光帝朱由崧是万历帝宠妃郑贵妃的孙子，在南明朝廷建立之际，东林党人竭力拥戴潞王朱常澍即位，认为“潞王立，则无后患罪，且可邀功”。新仇加旧恨，即位后的朱由崧自然对东林党人颇为不满，重颁《三朝要典》打击东林党人。而这，又掀起一场风波，加剧了弘光朝廷的党争。

四

《三朝要典》颠倒黑白，连清朝统治者也看不过去，将其列入禁毁书目。军机处在奏折中说：“其书名为敕修，实一时阉党借此罗织正士献媚客魏，中间颠倒是非，天良灭绝，本应毁弃，又有狂悖之处，应请销毁。”

《三朝要典》开启了修史以助党争的先例，无怪乎明末著名文学家、抗清英雄吴应箕，在《启祯两朝剥复录》一书中认为，《三朝要典》欲盖弥彰，是杀人之书，可谓一针见血。这部书也成为史上臭名昭著的“名著”。

雪夜围炉读书，是一种诗意生活。不过，读书不一定雪夜，也未必在雪夜。雪天也可。

下雪天，书城闲逛最是惬意。天冷，服务员躲到了一边，看不到他们刀子般的眼光，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翻阅。喜欢的，感兴趣的，看一看。有启发的，偷偷用手机拍下。没有喜欢的放到一边。

翻得兴起。“啪！”门帘掀开，冷风直灌，一年轻人，直冲服务员问，有没有王羲之诗词的书？服务员一愣，弱弱地说，王羲之诗词的书似乎没有。接着又补充，王羲之书法的有不少！那人一愣，忙说，就书法的了。这下，服务员算是明白了，东一本西一本，片刻，那人便抱了一堆“王羲之”结账出门了。

面对书山，究竟该怎么读书？

《傅雷家书》中，有一段说

如何读书，读来很有启发。傅雷说：“阅读不宜老拣轻松的东西当作消遣，应当每年选定一两部名著用功细读。比如丹纳的《艺术哲学》之类的，若能彻底消化，做人方面、气度方面，都有进步，不仅仅是增加知识而已。”

这就是傅雷读书法。

阅读大体有两种方式：浏览与精读。傅雷读书法讲的就是精读。不过，精读的前提是有目标。

一个人的读书时光中，精读的书，也就三四本，不离身，读一遍，有一遍的收获。有人专攻《道德经》，有人读《易经》。宋代赵普精读的书，只是半部《论语》，由此留下“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故事。吃透，读透一本经典，然后才能触类旁通。

雪天，去书店，乱翻书，真是好享受！

（摘自《中年读者》王文元/文）

傅雷如何读书